

KSZYXSYZDZSJJ

马克思主义哲学

视域中的

MAKESIZHUYIZHIXUE

SHIYUZHONGDE ZHISHIJINGJI

知识经济

陈志生
周宏
吕世荣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 视域中的 知识经济

MAKESIZHUYIZHIXUE
SHIYUZHONGDE ZHISHIJINGJI

陈志生 周 宏 吕世荣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知识经济/陈志生,周宏,
吕世荣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3
ISBN 978-7-215-06347-1

I. 马… II. ①陈…②周…③吕… III. ①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②马克思主义-知识经济-研究
IV. ①B0-0②E06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9184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81 千字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知识经济的兴起及概念辨析	16
第一节 美国新经济的兴起及其启示	17
第二节 知识经济概念的由来	21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对于知识的经济学分析	25
第四节 知识经济概念辨析	29
第二章 知识经济对西方经济学的冲击	39
第一节 知识的测度及其经济学意义	39
第二节 经济人抽象的根据及其局限性	48
第三节 经济哲学与科学哲学	57
第四节 美国新经济对西方经济学的冲击	64
第五节 几点评论	72
第三章 知识经济与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基础	84
第一节 知识经济与变量的可度量性和数学方法在 经济学中的适用性	87

一、变量的可度量性对西方经济学的困扰·····	87
二、知识度量问题的特殊性和数学分析的不适用性·····	99
第二节 知识经济与人类经济生活中的确定性和 不确定性·····	102
一、西方经济学对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认识 ·····	102
二、知识经济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	106
第三节 知识经济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主义和假设演绎 方法·····	109
一、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和假设演绎方法的主要特点 ·····	109
二、知识经济与西方经济学形式理性主义认识论 ·····	114
第四节 知识经济及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	117
 第四章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	119
第一节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的 批判·····	119
一、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	120
二、马克思对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	128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 ·····	136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142
第三节 实践原则和唯物辩证原则·····	143
一、马克思实践原则的建立 ·····	143
二、马克思实践原则的基本内容 ·····	147
三、马克思唯物辩证原则的确立 ·····	152
四、马克思唯物辩证原则的基本内容 ·····	158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逻辑上升方法·····	162

一、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内涵	163
二、阶级分析的具体性和历史性要求	165
三、无产阶级的阶级实践是经济社会批判走向现实的 基本途径	167
四、逻辑上升方法的基本含义	170
五、“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方法	175
 第五章 知识经济时代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182
第一节 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与 发展方式	182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科学方法是其实现对 现实关注的方式	183
二、从哲学批判向经济学批判的演进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存在方式	188
三、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发展方式	192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	195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实践方式	196
二、实践方式实现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	199
三、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意识形态中的指导 地位	206
第三节 论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的哲学批判精神	208
一、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中哲学批判的性质	209
二、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中哲学批判的内容	212
三、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特点	218
第四节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及实现方式的哲学思考	220
一、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实现方式之间的关系	

.....	221
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及实现方式演进的过程	225
三、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实现方式的变化引发的思考 ...	231
参考书目	234
后 记	239

绪 论

知识经济首先和主要的是一种经济现象,理应得到经济学界最多的关注和研究,同时,由于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具有许多全新的特点,需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上研究知识经济的经济学意义。至今为止,以新古典综合派为主流和核心的西方经济学界对于知识经济的研究,主要以罗默、卢卡斯、贝克尔等人所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或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这些研究也确实增进了人们对知识的了解和认识。新经济增长理论以新古典综合派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在将技术进步内生生化方面提出了一些寓言式的解释,这不能够认为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因为新古典综合派的分析框架在研究由知识经济所引起的许多基本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和难以克服的困难。例如,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无法适应知识经济核算的要求,如何测度知识产品的价格与价值,如何测度知识的投资回报率,这些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人们至今也不知道如何测度知识,也不知道这种在知识测度问题上的无知状态意味着什么。这对于以变量的可度量性为基础,但自 70 年代以来,一直在为解释和克服经济生活中的滞胀局面而苦苦挣扎的西方经济学就不仅仅是雪上加霜,而且是致命的一击,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西方经济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哲学方法论基础。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滞胀局面,使新古典综合派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而随后爆发的石油生产危机,则又引发了1973年至1975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最终使西方世界的滞胀经济转化为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的声誉一落千丈,跌到了谷底。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有一个形象的描述:“由于经济学的药方不仅没能解除疾病,反而似乎加剧了病情,政治家们和公众都已变得不耐烦了。他们开始避免与经济学家交往,就像任何关心自身崇高声誉的人讨厌与占星学家、炼丹术士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江湖骗子打交道一样。”^①想想五六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的风光劲头,真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不过,新古典综合派的主流地位虽然受到了动摇,但其他非主流学派也只是提出了一孔之见而无法解决实质性问题。因此,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呈现出学派林立、相互混战的战国局面,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取代不了谁。这自然引起了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性反思。自那时以来,有大量文章和著作宣称西方经济学陷入了严重的或许是致命的危机,一些经济学家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前景深表忧虑。仅看一下这一时期所写下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的题目就足以让那些深深地热爱着西方经济学的人们为之心痛不已:《经济理论的危机》、《经济学的衰微》、《现代经济学思潮中的危险迹象》、《对抗经济学》、《经济学的贫困》、《经济学的终结》、《经济学的毁灭》、《经济学的死亡》等等。或许有人认为这些题目未免夸张,有故作惊世之语借以哗众取宠之嫌。然而,由克莱默和科兰德所作的一项调查在某种程度上却支持了上述论著所表达出来的忧虑,该调查的研究

① 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

对象是美国一流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调查显示,在这些可能成为经济学家的研究生中,对现实经济问题或经济学文献的兴趣之缺乏令人震惊。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克莱默和科兰德的调查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并引起西方经济学界对一流大学中经济学研究及训练的声讨与反思。在美国经济学会的资助和委托下,克莱默和科兰德进一步对美国经济学研究生的教育进行了全面评估。他们的评估报告对以下现象提出了强烈批评:在研究院中所传授的经济学日益脱离实际而为形式化的技巧所主导。这也印证了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库特纳的类似批评:“经济学系培养了一代白痴学者作为接班人。这些白痴学者精通深奥的数学,却对实际的经济生活一无所知。”^①

在这些学者看来,现代经济学已呈现出某种病态,它已日益成为一门为其自身而非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存在的智力游戏,经济学家们已逐渐将这门学科转化为某种形式的数学。在其中,作者似乎只关心分析的精确性,而实证的相关性则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一个问题不能通过建立正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就会认为它属于低层次的研究而不屑一顾。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形式主义对现代经济学的困扰。对此,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有着更为激烈的批评。布劳格指出,人们只需随意翻阅《美国经济评论》或《经济学杂志》,就会怀疑自己是否降落在一个奇怪的星球,到了另一个世界,因为单调乏味似乎已成为专业经济学出版物所刻意追求的目标,更不用说《经济计量学》和《经济学研究评论》等杂志了。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经济学就被斥为“阴暗沉闷的科学”,布劳格则认为,现在看来,昨日“阴暗沉闷的科学”也不比今天的经院经济学更为催人入

① 转引自胡代光:《关于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现实透视》,《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11期,第47页。

眠。

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并克服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趋向。在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中,只要是运用数学方法,就总是需要提出一些假设条件,进行形式化处理,并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分析。但是,过分的形式化和模型化,主观随意地提出一些假设条件,毫不在意这些假设条件的现实性,任由思想在虚构的世界中自由驰骋,就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形式主义是科学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要认识西方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就需要对科学主义作进一步的分析。

科学主义有两种存在情况,这就是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科学主义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科学主义。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科学主义表现为实验而实验,为理论而理论,形式上使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却并未得到科学的成果,忽视实验和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科学主义则有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是在并不适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学科里面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强调要运用数学方法建立理论模型来进行分析研究;第二,是在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学科里面犯下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科学主义的错误。在西方经济学中,这表现为形式主义。上述两个层次并不是平行并列的,第一个层次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里面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前提和基础。

西方经济学中形式主义问题的存在说明西方经济学家们肯定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适用性。所谓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在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眼里,就是指西方经济学是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如果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假以时日,西方经济学一定可以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由于自然科学中的可重复的受控条件下的实验方法并不适用于经济学的研究,因而西方经济学所运用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就主

要是以同质性为基础的形式逻辑的数学方法,具体表现为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假设演绎方法。因此,西方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运用数学方法建立理论模型来进行分析研究。凯恩斯说过,经济学是一门按照模型进行思维的科学。萨缪尔森则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惯常使用的讲故事的方式给人们讲了一个故事,以说明西方经济学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化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漂流到一个孤岛上,十分饥饿。这时,海面上漂来一斤罐头,可谓天无绝人之路。围绕如何打开罐头,三位专家各有高见。物理学家认为可以用岩石将罐头砸开;化学家主张生火,将罐头加热,利用蒸汽将罐头冲开;最后,轮到经济学家出主意了,他说,让我们假设我们有一把开启罐头的起子。且不论故事中所包含的讽刺意味,这个故事也确实道出了西方经济学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的实质。

故事只是打比方来说事的,是对事不对人。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的愚蠢而又幼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经常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据网上介绍,1992年6月13日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载了如下一个笑话,说是有一天,爱因斯坦碰到了三个新西兰人,为了打发时间,爱因斯坦就和他们聊了起来。为了有针对性地聊天,爱因斯坦首先了解他们的智商。第一个人回答说智商是190,爱因斯坦很高兴:“我们可以讨论原子物理学和我的一些理论观点。”第二个人回答说他的智商是150,爱因斯坦就说:“我们可以讨论新西兰为追求世界和平所确立的核不扩散条约。”第三个人说他的智商只有50,爱因斯坦听后稍作踌躇,然后问他:“你预计明年的财政赤字是多少?”没有人会认为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都是一些智商很低的人。国内外的情况都表明,那些热衷于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如果不是同龄人中的最优秀者,也是顶顶优秀的。

聪明人犯错误在很多情况下主要是由于他们做了唐吉珂德式的人物而不觉,胡言乱语,提出一些错误而且是愚蠢的问题,试图向

不可能的事物挑战。加尔布雷思一直对正统的西方经济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对于很多西方经济学家所热衷的经济预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有两类经济预测专家:一类是不知道经济状况的,另一类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孔夫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些强不知以为知,自以为天下虽大,但事无巨细,没有他们所不知道的人,必然会提出一些错误而且愚蠢的问题,成为蠢而无用的人。在西方经济学中,就有着这样直接而且简明的例子,说明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多么错误而且愚蠢的问题。

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中,所有问题都是在确定性条件下提出和解决的。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都清楚市场情况,因而他只需要在约束条件下计算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就能最大化其效用。但实际的市场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市场参与者的理性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因而他只能在不确定的条件下采取行动。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市场参与者只能对自己的成本和收益作大致的预期。为了分析这种情况,20世纪40年代冯·诺伊曼和摩根斯特恩提出了预期效用理论,使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也能够分析不确定条件下的市场行为。但此后的西方经济学家显然走得太远,他们中的一些人竟然把预期效用理论用于分析经济生活中的创新,提出“对创新的预期效用”这样不伦不类、自相矛盾的观点。因为真正的创新就是创新,是过去和现在所没有的东西,是人们不可能预测到的东西。如果认为人们可以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的预期效用理论把创新纳入人们的市场行为,也就意味着人们事先就知道了创新,如此一来,创新也就不是创新了。此处给出了市场经济的最后界限,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无处不在的;它既然不是无处不在的,也就不是无所不能的。

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在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任何阶段,外部自然界都存在着广阔的未知领域。因此,经济生活中的创新是标志人类对未来有待认

识和改造的自然的无知状态的一种不确定性。一切创造性行为,包括科学的发现、技术的发明以及经济生活中的其他的创新行为原则上都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可以肯定,人类不可能建立完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果认为现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完全将技术进步内生到经济分析中来,这就割断了人类社会和外部自然界之间的必然联系,没有认识到这一必然联系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意义。在用来证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的阿罗—德布鲁体系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最初,阿罗—德布鲁体系是在确定性条件下构造和证明的,后来德布鲁把它推广到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市场环境。德布鲁做出如下假设,对于任一不确定性事件,都给它一个生产者的产出,这样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就可以分析了,一般均衡理论仍然成立。但是,这样处理不确定性,实际上排除了由人类社会和外部自然界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标志着人类的无知状态的不确定性,对于这种不确定性,人们是不可能给它一个产出的,假设可以给它一个产出,这就不是无知而是有知了。因此,这后一种不确定性原则上是不可能人类已有的任何分析框架里面加以分析的,把它引进阿罗—德布鲁体系,这一体系就是不可能得到证明的。这样,亚当·斯密所提出的那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之所以看不见,就是因为它不存在。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在研究诸如经济生活中的创新这种不确定性时,把实际上人们不可能知道的技术进步引进了理论体系的话,那么,在研究人类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生活时,却又把实际存在的技术进步给忽略了。这里的关键在于技术水平不变的假设,这就把技术进步作为外在变量给排除出经济分析了。如果说在微观的、静态的、短期的经济分析中,人们还不可能发现技术水平不变假设的错误意味着什么,那么,在宏观的、动态的、长期的经济分析中,这一错误立刻就变得十分明了。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索洛为代表的一批经济

学家就向人们展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在长期的宏观的经济增长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这种建立在技术水平不变假设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不能解释的,这就产生了后来被称为索洛余数的增长剩余。这一剩余,在索洛那里,达 87.5%,显然是太大了,此后舒尔茨、丹尼森、肯德里克、库兹涅茨等人进行了修正,但仍在 60% 以上,而且在舒尔茨对 20 世纪初美国农业发展所做的研究中,这一剩余还是在 80% 左右。

西方经济学以实证分析为基础的假设演绎方法,主要是通过数学方法的运用建立起理论模型来进行分析研究,这也就是认为,所有的经济现象都是由几种经济变量所决定。因此,初看上去,要消除索洛余数并不会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这只是一个很平常的问题,只要在增长理论中引入代表技术进步的变量就可以了。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从 50 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 80 年代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是,深入的分析表明,遵照这种思路所进行的研究,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困难,这就是技术进步的可度量性问题。因为数学方法的运用是以变量的可度量性为前提的,如果技术进步的可度量性得不到解决,那么上述研究的科学性就是很成问题的。这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 70 年代趋于衰微的基本原因;而 80 年代重新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在解决技术进步的度量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在技术进步的度量问题之外,关于技术进步的内涵和外延一直也没有明确下来。教育、人力资本、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等虽然都与技术进步有联系,但又不能划入技术进步范畴。90 年代兴起的知识经济研究有助于克服上述问题。知识可以涵盖上述各种因素而成为一个更具解释力和更具普遍性的概念,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可以包含在知识经济研究当中。和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作为变量相对应,在知识经济研究中,则把知识作为变量以纳入生产函数之

中,因而都面临着变量的可度量性问题。和度量技术进步所存在的困难相比,度量知识所存在的困难一点也不少,而且是更加严重了。

美国研究知识经济问题的学者安妮·卡特分析了知识度量所存在的困难,她认为人们除了承认对这一问题一无所知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理想地讲,要想研究知识经济,人们可能愿意测度经济活动的知识含量。我不知道如何对此进行测度,并且就我所知,没有人知道如何做这件事。引用物理学家喜欢说的一句话,‘我们甚至不能犯错误’。”^①考虑到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最后一句话并不准确,但除此之外,安妮·卡特的论述是完全准确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不过,并不能由此认为,知识经济的研究就不能开展了。人们虽然不知道如何度量知识,但完全可以研究这一困难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意味着什么,这当然是针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的。彼得·豪维特就作了这种分析,他认为:“手头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对国民收入核算的实践做微小的修补来解决。根本的问题是,国民收入核算所依赖的概念基础把知识当做不变和自由获得的东西,从而排除了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市场价格和数量都是一个人需要度量的经济活动。然而,在一个增长基于知识的创造、获取和使用的世界中,我们需要看的是其他的量,并且在我们知道看什么和如何看之前,需要一个更好的概念基础。”^②这就把问题引向了更加广阔和更加深入的领域。

人类的认识并不是照镜子式的机械反映过程,观察和理论总是相互渗透的。人们在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时,总是要运用已有的理论和方法的。因此,问题的出现至少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一是已有的理论和方

① 戴尔·尼夫等主编:《知识对经济的影响力》,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② 达尔·尼夫主编:《知识经济》,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法不适于研究新的情况。所以,在解决新问题时,就需要对已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批判性反思,看已有的理论和方法是否可以运用于新情况,是否需要创立新的理论和方法。人类的认识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所以,这种批判性反思就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关于知识度量的困难,首先就是由于沿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所引起的,错误在于相信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适用于研究知识这种其实是不可度量的变量。因此,和安妮·卡特所说的相反,不是人们甚至不能犯错误,而是人们一直在犯着错误。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现在对知识经济的研究,人们一直在犯着同一个错误——这就是试图度量一些其实是不可度量的因素,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

如果知识只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或者,虽然知识举足轻重,但不是基本变量,即它是由更基本的变量所决定的,是派生变量,那么,即使知识不可度量,也不会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构成多大的威胁。但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知识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一直起作用的变量,并不是由更为基本的变量所决定的;相反,知识倒是最基本的变量,其他的变量,如资本和劳动力,是由知识所决定的,是知识变量的派生变量。所以,如果知识是不可度量的,那就可以肯定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不适于知识经济的研究的,这就彻底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基础。

由知识的不可度量性,可以肯定,在把知识纳入经济分析以后,继续因袭西方经济学现有的研究方法,就会成为一种科学主义,有科学性之名而无科学性之实。这种科学主义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第一个层次上的科学主义,因为知识的不可度量性从根本上否定了以数学方法的应用为特征的假设演绎方法的适用性,这种方法是以变量的可度量性为前提的。至于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于把知识作为外生变量排除在外,因而就不仅仅是科学主义的问题,归结为科学主义未免是避重就轻、轻描淡写,太客气了。在根本上,现